

“厌女症”的生成：《奥瑞斯忒亚》中伦理身份的重新界定

The Generation of Misogyny: The Redefinition of Ethical Identity in *Oresteia*

任 晓 (Ren Xiao)

内容摘要：在《奥瑞斯忒亚》中，埃斯库罗斯巧妙地将古希腊城邦的当代问题，特别是公元前5世纪女性在公共生活中逐渐边缘化的处境，融入到阿特柔斯家族的叙述中。在此基础上，埃斯库罗斯在前两部中设置了父、母、子和女等不同伦理身份所面临的选择困境，呈现了家宅内部血亲谋杀所导致的性别对抗。直到最后一部《和善女神》，理性意志以法庭裁决的形式结束了个人正义主导的复仇循环，从而在侧面反映了在一个男性逐渐主导公共生活、女性则被边缘化至附属地位的体系中，一种对女性的持续性偏见和敌意，即厌女症的孕育和延续。

关键词：埃斯库罗斯；奥瑞斯忒亚；伦理选择；伦理身份；厌女症

作者简介：任晓，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生，主要研究领域为古希腊悲剧伦理与科技伦理。

Title: The Generation of Misogyny: The Redefinition of Ethical Identity in *Oresteia*

Abstract: In *Oresteia*, Aeschylus skillfully integrates contemporary issues of the ancient Greek polis, especially the marginalization of women in public life during the 5th century BC, into the narrative of the House of Atreus. Aeschylus, within the preliminary two parts of the trilogy, artfully constructs a tableau of ethical quandaries confronting various familial identities—father, mother, son, and daughter—thereby illustrating the gender antagonisms spurred by acts of familial homicide. It is only in the concluding play, *Eumenides*, that the cycle of personal justice driven by retribution is brought to a close through the medium of a judicial verdict by rational will, thereby indirectly mirroring the gestation and perpetuation of a sustained bias and hostility towards women, namely misogyny, within a system where men increasingly dominate public life and women are marginalized to subordinate positions.

Keywords: Aeschylus; *Oresteia*; ethical choice; ethical identity; misogyny

Author: Ren Xiao is Ph.D. Candidate at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20, China). Her research interests are ethics in ancient Greek tragedy and technological ethics (Email: 740797760@qq.com).

引言

埃斯库罗斯创作生涯主要集中于公元前5世纪, 彼时民主制度初具雏形, 以“公民平等”、“权力制衡”和“城邦至上”为特征的新的民主制度与强调“家庭、权利和个人价值与荣誉”的旧式贵族观念之间正在形成矛盾。¹ 基于新旧更替的政治动荡, 古希腊城邦中性别伦理的转变相继出现, 直至古典时期, 女性被确立为“低等生物”。公众普遍认为其在“智力与心灵”层面明显弱于男性, 且往往被排斥于公共生活之外, 并“天生倾向于邪恶”。作为古希腊社会中妻子的职责是“管理整个家庭”和“养育子女”(Katz 77)²。大多数雅典作家认为, “女性进行的任何非宗教的公共活动都违反了一个贤惠妻子必须具备的沉默、不可侵犯和道德依赖的特质”(Foley 111)。

与此同时, 男性则延续着地生神话(autochthony)的传统, 进一步宣扬男性的公共性地位。在古希腊人的视野中, 三代先王刻克普洛斯、厄里克托尼奥斯和厄瑞克修斯均为地生。他们具有神性的高贵血统, 不经由男女结合, 没有母亲, 彼此之间的关系模糊不清, 但以男性的传承形成虚假的世系关系。³ 实际上, 地生神话排斥了女性的公共合法性, 并试图建立一种没有异性恋纠葛的男性友爱共同体。假设本土神话一味强调城邦“生子”的意识, 最终的结果指向女性生育者地位的下降⁴, 从而导致大量女性群体的合法地位的压制。

《奥瑞斯忒亚》(*The Oresteia*)⁵三联剧⁶于公元前458年在雅典的狄奥尼

1 参见 Mark Griffith, “Brilliant Dynasts, Power and Politics in the *Oresteia*,” *Classical Antiquity* 1 (1995): 65-66.

2 本文外文引文出自笔者译。

3 参见 Nicole Loraux, *The Children of Athena: Athenian Ideas about Citizenship and the Division between the Sex*, translated by Caroline Levine,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24.

4 参见 Richard Rader, “And whatever it is, It is you: The Autochthonous Self in Aeschylus’s *Seven Against Thebes*,” *Arethusa* 1 (2009): 10.

5 本文引用西方古典文献的译文, 均系笔者依据古希腊原文, 并参考不同英译本、中译本译出。文中的引用标注西方古典学通行编码, 埃斯库罗斯剧作行码随文标注。埃斯库罗斯剧作的古希腊原文参见 Aeschylus, *Oresteia: Agamemnon, Libation-Bearers, Eumenides*, translated by Alan. H Sommerstein, MA: Harvard, 2008。由于《奥瑞斯忒亚》是由三联剧的形式构成, 本文在引用时采用简写的形式, 即《阿伽门农》简写为“Ag.”, 《奠酒人》简写为“Cho.”(由希腊文“Choephoroi”而来, 是其常见简写形式), 《和善女神》简写为“Eum.”。

6 指《阿伽门农》(*Agamemnon*)《奠酒人》(*Libation-Bearers*)《和善女神》(*Eumenides*)。

索斯剧院上演，其体现的正是古希腊女性地位边缘化的过程，并以“厌女症（Misogyny）”的形式呈现。古斯塔夫·格罗斯曼（Gustav Grossman）指出埃斯库罗斯笔下的女主人公具有负面的特征：“在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中，无论是幸运还是不幸，欢乐还是悲伤，女性和东方人同样地缺乏自制力；奴性、懦弱或专制的犯罪；骄奢淫逸；在直接的咒语下；缺乏可靠性和常识”（228）。弗若玛·泽特林（Froma I. Zeitlin）聚焦于古希腊语境的厌女症现象，指出《和善女神》中以奥林匹斯诸神的地位高于复仇女神为代表的原始神，男性高于女性的解决方案，延续的是父系婚姻的秩序，并最终造成了女性成为附属于男性的妻子和女儿的附属地位¹，从而指出埃斯库罗斯在《奥瑞斯忒亚》中的“厌女”倾向。进一步地，乔治·纽唐（George Newtown）则直接指出，在古希腊人的视野中，“女性强大、危险、性欲过盛、天真烂漫并且缺乏自控能力，只有男性才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进行道德判断”（142）。除此之外，莎拉·伊莱斯·约翰斯顿（Sarah Iles Johnston）、彼得·尤本（J. Peter Euben）以及理查德·西弗德（Richard Seaford）等人在《奥瑞斯忒亚》的性别问题上也有独到见解。²

总的来说，以上学者均关注到《奥瑞斯忒亚》的“厌女症”现象，但并未从更广泛的城邦生活中，分析性别关系的持续嬗变过程。因此，本文在以往学者的研究基础上，旨在通过分析《奥瑞斯忒亚》的文本，着眼于公元前5世纪的城邦现实，借助伦理选择的相关理论³，细致地分析剧作中人物的伦理困境，从而对古希腊伦理背景下的性别动态进行深刻的探索，以期对当下性别问题的解决提供借鉴意义。

一、处女的“献祭”：共同体规范中的女性境况

《阿伽门农》的剧情起源于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对海伦的劫掠，这成为诸多与英雄相关的归家故事中预设的伦理结（ethical knot），其特点是“并未出现直接在文本中，但在人物叙述中被提及”（Ni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191）。而在具体的《阿伽门农》的文本中，伦理结的设定进一步细化到伊菲革涅亚的献祭，她的死亡过程并未直接展现在文本中，而是经由歌队之口转述。在歌队的叙述中指明了献祭的原因，即阿尔忒弥斯不忍

1 参见 Froma I. Zeitlin, “The Dynamics of Misogyny: Myth and Mythmaking in the Oresteia,” *Arethusa* 11 (1978): 173.

2 参见 Sarah Iles Johnston, *Restless Dead: Encounters between the Living and the Dead in Ancient Gree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9, 264; J. Peter Euben, “Justice and the Oresteia,”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 (1982): 27; Richard Seaford, “Aeschylus and the Unity of Opposites,” *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123 (2003): 141, 157.

3 有关“伦理选择”的术语解释参见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89-207; 聂珍钊: “人文研究的科学转向”, 《文学跨学科研究》4 (2022): 563-568 等。

战火心生怜悯，以风暴阻挡阿伽门农联军船只的行进，最后停止狂风的方法是献祭伊菲革尼亚。更重要的是，文本重点突出了阿伽门农必须面对的伦理选择：一方面是客观的伦理标准，即遵循盟约的要求，牺牲女儿继续征战；另一方面是主观的伦理标准，即出于一个父亲对女儿的爱与责任，放弃征战。在这种情况下，阿伽门农陷入二重困境：

那年长的国王放声回答：“若不服从，命运险恶；这实在难以抉择，如果我必须杀死我的孩子，家宅的荣耀，并在祭坛边用处女的血流，染污父亲的手。可哪一种办法没有痛苦？我又怎么能成为舰队的逃兵，让我的盟友在战场上失败？须知为阻住这猛烈的风暴，人们迫切地希望献祭，用一个处女的鲜血献祭，合乎情理。（Ag. 205-218）

阿伽门农的选择显示了个人生命与集体利益的张力，他先是指出作为父亲的伦理身份“献祭”女儿的悲痛，又进一步提出“哪一种办法没有痛苦”，由此引入不可违背盟友誓言的论断，并最终得出“人们迫切地希望献祭”的结论。通过戏剧性的哭诉，阿伽门农放弃了自然血缘身份的天然纽带，选择遵循客观的伦理标准。阿伽门农的选择，一方面取决于当时的伦理环境，即城邦“友爱共同体”的影响。¹在“友爱共同体”中，公民之间趋于利益进行关系的连接，目的是城邦生活的更好，这是一种整体利益。作为体现共同体友爱的“主客关系”（*xenia*）中的一种重要形式是家族之间的军事联盟——矛友（*spear-friends*），其主要功能是“在军事背景下互相帮助”的个人盟友，即“通常通过在战役中一起战斗体现”（Griffith 69）。男人的政治和军事职能是作为公民存在的直接证明和荣誉来源，以城邦利益至上是男性公民必须遵守的规范。在家庭与城邦之间，阿伽门农的伦理身份是城邦的一员，而非家庭中的父亲。在伦理选择中，他必然要遵从公认的习俗规范，从而杀死女儿，犯下禁止血亲残杀的伦理禁忌。另一方面，阿伽门农是联军的统帅，权力的掌握进一步影响其伦理的选择。高位者在进行伦理选择时，其自身的权力赋予其决策的自由性，也就是说，阿伽门农完全可以选择放弃“献祭”。然而，同时他也意识到自身的选择承担着巨大的道德后果，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大范围影响。因此，对阿伽门农这样的高位者来说，在面临重大伦理困境时，可能倾向于以集体至上来以此维护更“大”的“利益”。

与此同时，阿伽门农的“献祭”也指向处女所在家庭中的伦理身份。伊

1 在现代意义层面，“φιλία”一般直译为“友爱”，在古希腊伦理中其主要使用范围可划分为三个层面：“共同体友爱（community philia, κοινωνική），其中包括主客关系（*xenia*）”、“同伴友爱（companionship philia, εταιρική）”、“家庭友爱（family philia, συγγενική）。参见 Elizabeth S. Belfiore, *Murder Among Friends: Violation of Philia in Greek Traged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6.

菲革涅亚处于受庇护青年和婚姻生活之间的边缘地位，她的情感和道德甚至生命不可分割地与家庭，尤其是父亲权威联系在一起。在危机的状况下，以伊菲革涅亚为代表的处女，往往不得不选择放弃婚姻，为家庭或城邦牺牲自己的生命。当阿伽门农决定献祭伊菲革涅亚时，将她“如同羔羊般放在祭坛上”（Ag.233），“通过武力，用缰绳使她沉默”（Ag.238）。埃斯库罗斯通过使用“羔羊”和“缰绳”等形容动物的词汇，将少女视为安静、顺从、任人宰割的猎物，一个为了共同利益而牺牲的祭品，以此暗示城邦共同体对古希腊女性“审慎”美德的要求。实际上，“埃斯库罗斯从文学前辈中继承了审慎的多重含义”，其中，女性的审慎美德主要指向“沉默”（Karathanasis 4），伊菲革涅亚正是这样一个典型的沉默的被置于祭台上牺牲品，她的选择显示了家庭与社会权力结构中不平等对个人自由的影响和个体生命的威胁。

基于共同体的军事联盟利益和处女的依附性地位，阿伽门农的伦理选择呈现了男性随意处置女性生命的权力。作为女性的反抗者——克吕泰墨涅斯特拉则以“谋杀”完成女性权力的夺取。她将“妻子”的伦理身份放置一旁，集中于“母亲”的自然血缘本质，将自身的伦理选择视为正义的复仇，把阿伽门农必死的理由列为对伊菲革涅亚之死的复仇，这显示了她的行动受到强烈的情感驱使。情感判断促使克吕泰墨涅斯特拉在妻子和母亲的身份之间进行伦理选择，非理性的驱动造成了道德判断的干扰因素，从而使她陷入盲目的状态，并合理化和正当化了复仇行为，无法客观评估个人行为所产生的后果。于是，在克吕泰墨涅斯特拉完成为女儿复仇的同时，违反了作为一个妻子在家庭中承担的义务，模糊了追求正义与个人复仇之间的界限，最终的结果并非恢复道德的平衡，而是引发无止境的复仇循环。因此，当她推翻了统治获得了专制权力时，她也被恐惧所控制，奥瑞斯特斯的复仇烈焰已经悄然升起。

二、“弑母”的合理化：假性父系伦理中的父亲权威

在阿伽门农死后，其家人和朋友并未正式地为其哀悼，因为奥瑞斯特斯流于外邦，埃勒克特拉被关在家里，以泪洗面，阿尔戈斯的公民不被允许参加葬礼和哀悼。在剧作的开头，未被安抚的阿伽门农亡灵即将迎来恰如其分的仪式，奥瑞斯特斯在阿伽门农墓前祈祷并祭奠亡灵。他来到父亲的墓前，申明自身的合法性，并强调自身的行为是为父亲报仇：“冥界的赫尔墨斯，父亲权威的守护者。我请求你成为我的救世主和盟友！我从长期的流放中回来，为我的父亲报仇。他死于一个女人的之手，死于一场秘密的背叛”（Cho.1-3）。很明显，奥瑞斯特斯选择“父亲权威的守护者”作为盟友，是将父亲的合法性和地位放置于首要的位置，这是其所处的伦理环境决定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他遵循父系正义的传统，将父亲为代表的男性作为城邦至上和公共秩序的守护者，城邦母亲是真正的母亲，神圣“父亲”直接来自于神，真正的母亲被隐去。因此，在这种语境下，奥瑞斯特斯将复仇视为自然且必然

的使命，选择作为“父亲”的复仇者，是基于传统的“合法性”的必然。

然而，当奥瑞斯特斯真正面对“弑母”的境况时，作为自然血缘意义上的“父亲”和“母亲的儿子”的双重伦理身份，使他的伦理选择变得艰难。同时，克吕泰墨涅斯特拉在面临强有力的奥瑞斯特斯，戏剧性地呼吁她的儿子努力自救，“住手，我的孩子，我的儿子啊，请在这乳房前羞愧，你曾无数次在上面一边半睡半醒，一边用你的小乳牙吸出丰富的乳汁”（Cho.896-898）。克吕泰墨涅斯特拉通过回忆母亲和婴儿的爱——“乳房”，“乳汁”来劝阻奥瑞斯特斯的谋杀意图。当她逐渐以话术迷惑儿子，使之陷入迷茫并且说出“母亲”（Cho.900）一词，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奥瑞斯特斯在谋杀现场对克吕泰墨涅斯特拉使用“母亲”。此时，随着皮拉德斯的回应——“那么，洛克西阿斯在皮托传递的神谕以及忠诚的誓言，还怎么办呢？宁愿与众人为敌，也不可违反神谕”（Cho.901-902）。这段回应消解了克吕泰墨涅斯特拉的“道德”请求，因为神明确指出为父报仇的指示。同时，奥瑞斯特斯长期流放于外邦，克吕泰墨涅斯特拉并未抚养其成人，因而她只能作为自然意义上母亲的身份存在，奶妈是实际的抚育者，她用乳汁喂养奥瑞斯特斯，时常彻夜难眠，殚精竭虑，费尽心思揣测婴儿的心理，同时还要洗涤襁褓。¹更重要的是，克吕泰墨涅斯特拉提及的“乳汁”实则反转为“梦中给蛇哺乳”，那条蛇“连同乳汁吸出了凝血”（Cho.531-533）。奥瑞斯特斯在此前早将自己视为吸出乳汁和鲜血的蛇：

我向脚下的大地和父亲的坟墓祈祷，希望这个梦能在我身上实现。看，我将解释梦境使之与现实符合。如果这条蛇和我一样有共同的出生，在我的襁褓中找到了一个温暖的家，在哺育我的乳房周围张开它的嘴，让血块和爱的乳汁混合在一起，使她在经历中恐惧地尖叫——那么，你可以看到，她孕育了这个可怕的预兆，所以她注定死于暴力。我变成了蛇，杀了她：这是梦里说的。（Cho.540-550）

在奥瑞斯特斯的描述中，“乳房”和“蛇”联系在一起。他之所以用动物意象解释家庭的谋杀，是为了暂时淡化观众心中的血缘关系。²一切的谋杀

1 关于“袒露胸脯”可以追溯到《伊利亚特》中赫克托耳（Hector）的母亲赫卡柏（Hecuba）。当赫克托耳在城门前等待阿基琉斯时，出于对儿子的担心，赫卡柏撕开了她的长袍，发出了她的呼吁。在《奠酒人》中，克吕泰墨涅斯特拉也作为母亲向孩子呼吁。然而，二位母亲之间的呼吁截然不同，克吕泰墨涅斯特拉和奥瑞斯特斯之间是充满敌意的，他刚刚杀死了她的情人，现在正计划要她的命。尽管这两个场景非常相似，但二者动机却大不相同。参见 K. O'Neill, "Aeschylus, Homer, and the Serpent at the Breast," *Phoenix* 3/4 (1998): 217-218.

2 参见 K. O'Neill, "Aeschylus, Homer, and the Serpent at the Breast," *Phoenix* 3/4 (1998): 219-220.

都成了自然界中物竞天择的规律，以此淡化其“弑母”行为的不道德性。奥瑞斯特斯借用巧妙的隐喻意象，将原本基于血缘的自然母子关系淡化和颠覆，以此促成“弑母”的合理性。至此，在伦理选择中，奥瑞斯特斯的身份完成彻底的转变，成为父系权威的继承者，进一步强化了男性在城邦生活中的地位和身份，从而加剧了“厌女症”生成的进程。然而，奥瑞斯特斯的“弑母”在某种程度上又违反了广泛女性群体的利益。于是，作为母亲的嗜血代言人——复仇女神将继续追踪奥瑞斯特斯。于是，观众将期待的目光投向第三部——《和善女神》，在这里，男性与女性、公共与家庭、新与旧之间的诸多问题正在通过理性解决。

三、雅典娜的裁决：基于男性联盟的政治性劝解

在《奠酒人》的结尾，奥瑞斯特斯已经被“愤怒的猎狗”包围，这里的“猎狗”正是复仇女神，即埃里倪斯们（Erinyes）。她们的母亲是“黑夜女神”（Eum.321），这充分体现了其与母亲角色的关系和本身单性生殖的特质，从而与三部曲中更广泛的性别冲突主题产生联系。作为原告一方的复仇女神质问奥瑞斯特斯的罪责，再次重申同一血缘的弑母罪必须得到严惩。作为被告方保护者的阿波罗在反驳过程中添加了新的例证：

并不是所谓的“母亲”生育孩子，她只不过是新生胚胎的抚育者，父亲是生育者。女性保护后代的安全，代表主人与宾客，神明不伤害她们。我会给你们有力的证据证明这一点。父亲可以在没有母亲的情况下生育，你身边的奥林匹斯神宙斯的女儿便是例证。她甚至没有在黑暗的子宫中长大，没有女神能够生育这样的后代。（Eum.658-666）

阿波罗将母亲的主要功能划分为保护和养育，并非“生育孩子”，力图排除女性的生理功能，进而限制其政治权利。阿波罗认为只有在合法的男性家庭成员身上实施暴力时，才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阿波罗通过列举雅典娜“没有在黑暗的子宫中长大”的特例，极大削弱甚至否定母亲权力。也就是说，阿波罗同时在生物遗传与神话层面否认母亲，宣称“丈夫-国王-男性”比“妻子-女王-女性”更重要。逻各斯与神话互相作用形成“联盟”，于是男与女、新与旧以及世俗与神圣等诸多议题在此汇集。通过雅典娜的诞生神话，新神拥护的正义体系下的神权在新的胚胎学中重述。¹

于是，论争的中心风暴来到了雅典娜的前面。雅典娜作为雌雄同体的形象，出生于宙斯的头颅之中，是宙斯理智的化身。于是，她直言“并非这世上哪个母亲生育了我”（Eum.736），“我完全属于父亲”（Eum.738）。宙

1 参见 Froma I. Zeitlin, “The Dynamics of Misogyny: Myth and Mythmaking in the Oresteia,” *Arethusa* 11(1978): 168-169.

斯作为阿特瑞斯的盟友讨伐帕里斯，雅典娜也将延续“父亲与父亲”的友爱关系，在裁决中站在奥瑞斯特斯一方。她将自己的一票投给了奥瑞斯特斯，并建立了以男性为中心的战神山法庭机构。雅典娜之所以作出基于男性身份的伦理选择，是因为她认为理性应该属于男性，女性是“暴力且不公平”的一方。她代表着“人头”，代表一种新的伦理意识，“人性因子即伦理意识，主要由人头体现，其表现形式为理性意志。人头是人类从野蛮时代向文明进化过程中进行生物性选择的结果。人头出现的意义虽然首先是人体外形上的生物性改变，但更重要的意义是象征伦理意识的出现”（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38）。显然，在埃斯库罗斯的剧作中，由雅典娜代表的理性意识指向男性中心。

然而，一切并未就此结束。在奥瑞斯特斯被法庭宣告无罪并离开后，被此结果激怒的复仇女神威胁通过“喷吐毒汁”、使“万物荒芜”和“抛洒瘟疫”的形式向雅典人发泄。复仇女神的泄恨正是报复性仇杀的延续，雅典娜在此承担了严峻的挑战。于是，她充分发挥“劝解”¹的力量，运用抚慰甜美的话语，在感情上试图平息复仇女神的怒火，借助宙斯权威与雷霆，在行为上震慑复仇女神的狂吼。同时声称复仇女神将持续作为恐惧的力量，在法律无法发挥作用的地方，继续惩戒僭越者。除此之外，雅典娜还将为复仇女神提供一处在战神山附近住处，享受公民的献祭与荣誉，以此明确规定女性活动的“正确”领域——即排斥于城邦公共政治生活之外的忠实的妻子、孩子合法的母亲和受人尊敬的城邦仪式的参与者。²于是，复仇女神实现了功能的转变，即从惩戒家族罪犯的埃里倪斯转而被雅典娜安抚，成为崇敬女神³，永恒居住于雅典城邦。

从整体过程层面看，《奥瑞斯特忒亚》中血亲仇杀问题的解决，是原始循环复仇中的“兽性因子”转化为理性的“人性因子”的体现。同时，“人性

1 “πειθω”之所以作为解决冲突的良药在于其神圣力量来自于佩托（Peitho）女神，在古希腊文学中，她在早期常作为情色诱惑的女神存在，而后发展为更普遍性的政治性“劝解”（political persuasion），作为围绕城邦生活构成的法律、政治与艺术的源泉。参见 Lain Entralgo, *The Therapy of the Word in Classical Antiquity*, New Haven: Yale, 1970, 64-71.

2 参见 Edith Hall, *Greek Tragedy: Suffering under the Sun*, New York: Oxford UP, 2010, 227.

3 伊迪丝·霍尔指出，埃斯库罗斯可能在这里结合了两种类型的古代女神，即埃里倪斯与“崇敬女神”（Semnai Theai）。雅典人可能长期以来一直崇拜在卫城的一个山洞里的“崇敬女神”（Semnai Theai），她们的主要功能是促进生育，并确保大地的果实的生长与畜牧的旺盛。在《和善女神》中，埃里倪斯们经过转化形成后变成“崇敬女神”，两类女神实现了功能的结合。一些古代资料指出，雅典娜将驯服的埃里倪斯改名为“和善女神”（Eumenides, The Kindly Ones），这个词没有出现在戏剧中，这部剧最初可能被命名为埃里倪斯，但后面呈现为“和善女神”。因此，一些学者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在进行这种改名的文本中，一定有一行文字已经遗失。经过学者的考察，该掉落的字行可能出现在雅典娜派出自己的游行队伍，将埃里倪斯们安置在新的洞穴住所（1021-1031）中时的演讲。参见 Edith Hall, *Greek Tragedy: Suffering under the Sun*, New York: Oxford UP, 2010, 74-75+224.

因子转化成理性意志在人身上发生作用，是引导人做人的道德力量”（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人类文明三阶段论” 8）。也就是说，通过复仇女神职能的变化，埃斯库罗斯引导公民从“以牙还牙”的个人复仇到城邦裁决的理性审判的转变，同时隐含男性在公共空间的主导地位。

在《奥瑞斯忒亚》前两部中，女性与男性在紧张的对立中，重复着谋杀复仇的循环模式，阿伽门农的家族俨然是巨大的混乱场。直到最后一部《和善女神》，埃斯库罗斯设计了一条解决冲突与争端的和平之路，即法律裁决。在“雌雄同体”的雅典娜的裁决中，以宙斯神圣正义维护下的法庭机构正式形成，城邦法律作为神圣律法的显现永恒地保障公民的友爱共同体生活。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实际上，三联剧并未实现真正的和谐。因为法庭的裁决建立在压抑女性地位和提高男性权利的不平等之上。复仇女神放弃了她们的一些权利，复仇的职能变得微乎其微。男性以理性为手段掌握着共同体的决定权，女性则降为仪式辅助功能。这种转变暗示着古希腊公元前 5 世纪城邦中的性别伦理，即男性通常在公共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女性则被限制在私人领域。

Works Cited

- Aeschylus. *Oresteia: Agamemnon, Libation-Bearers, Eumenides*, translated by Alan. H Sommerstein. MA: Harvard, 2008.
- Behler, Ernst. "A. W. Schlegel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Damnatio of Euripides." *Greek, Roman and Byzantine Studies* 4 (1986): 335-367.
- Belfiore, Elizabeth S. *Murder Among Friends: Violation of Philia in Greek Tragedy*. New York: Oxford UP, 2000.
- Entralgo, Lain. *The Therapy of the Word in Classical Antiquity*. New Haven: Yale, 1970.
- Euben, J. Peter. "Justice and the Oresteia."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 (1982): 22-33.
- Foley, Helene. *Female Acts in Greek Tragedy*. New Jersey: Princeton, 2001.
- Griffith, Mark. "Brilliant Dynasts, Power and Politics in the Oresteia." *Classical Antiquity* 1 (1995): 62-129.
- Grossman, Gustav. *Prometie und Orestie*. Heidelberg: Carl Winter, 1970.
- Hall, Edith. *Greek Tragedy Suffering under the Sun*. New York: Oxford UP, 2010.
- Homer. *The Iliad*, translated by A. T. Murray. London: Heinemann, 1924.
- Johnston, Sarah Iles. *Restless Dead: Encounters between the Living and the Dead in Ancient Gree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9.
- Katz, Marilyn. "Ideology and The Status of Women in Ancient Greece." *The History and Feminist Theory* 4 (1992): 70-97.
- K. O'Neill. "Aeschylus, Homer, and the Serpent at the Breast." *Phoenix* 3/4 (1998): 216-229.
- Karathanasis, Konstantinos. *Sophrosyne in Aeschylus*. 2017. Washington University, Master

Dissertation.

Loraux, Nicole. *The Children of Athena: Athenian Ideas about Citizenship and the Division between the Sex*, translated by Caroline Levine. New Jersey: Princeton UP, 1993.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13 (2021): 189-207.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 人类文明三阶段论", 《东吴学术》5 (2022): 6-13。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On the Three Stages of Human Civilization." *Soochow Academic* 5 (2022): 6-13.]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 "人文研究的科学转向", 《文学跨学科研究》4 (2022): 563-568。

[—, "The Scientific Turn of Humanities Studies."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4 (2022): 563-568.]

Newtown, George. "Vengeance is his: Justice in the *Oresteia*." *Journal of the Theoretical Humanities* 4 (1999): 135-146.

Rader, Richard. "And whatever it is, It is you: The Autochthonous Self in Aeschylus's Seven Against Thebes." *Arethusa* 1 (2009): 1-44.

Seaford, Richard. "Aeschylus and the Unity of Opposites." *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123 (2003): 141-163.

Zeitlin, Froma I. "The Dynamics of Misogyny: Myth and Mythmaking in the *Oresteia*." *Arethusa* 11 (1978): 149-184.